

曾枣庄 吴洪泽 著

壹

宋代文学编年史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凤凰出版社

曾枣庄 吴洪泽 著

壹

宋代文学编年史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
凤凰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宋代文学编年史 / 曾枣庄, 吴洪泽著. — 南京 :
凤凰出版社, 2010. 4
ISBN 978-7-80729-719-2

I. ①宋… II. ①曾… ②吴… III. ①文学史—编年
史—中国—宋代 IV. ①I209.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051148号

- 书 名 宋代文学编年史
著 者 曾枣庄 吴洪泽
责任编辑 李相东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凤凰出版社(原江苏古籍出版社)
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
发行部电话 025 83223462
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<http://www.ppm.cn>
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
印 刷 江苏新华印刷厂
南京市张王庙 88 号 邮编:210037
开 本 718×1005 毫米 1/16
印 张 183.75
字 数 2734 千字
版 次 2010 年 4 月第 1 版 201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80729-719-2
定 价 390.00 元(全四册)
(本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,电话:025-85521756)

序

宋代文学，在某些人看来是无足观的。宋荦《漫堂说诗》即云：“明自嘉、隆以后，称诗家皆讳言宋，至举以相訾警，故宋人诗集皮阁不行。”清初虽得吴之振等人揄扬，声望仍然有限。除朱彝尊、曹溶等少数人外，一般人根本很少接触过宋人诗文集。像以治杜诗著名的卢世㯝，三十岁都还不晓得有黄山谷，其余可知。时来运转是在道、咸以后。同光体诸家或言元嘉、元和、元祐“三元”，或言唐音宋骨，寢至于家东坡而户山谷。

然不旋踵而风气又变。五四新文学运动后，对整个古代文学有了一个新的解释，把唐代视为我国诗歌的黄金高峰期，宋代则仅取其词，回到明朝“一代有一代之文学”的那一套观念中去。所谓文学史，大体即依汉赋、唐诗、宋词、元曲、明清戏曲小说这一序列来论述，于是宋代的诗、文、骈俪尽遭抹煞。刘大杰《中国文学发展史》把宋代形容为诗的秋衰，行将入灭。冯沅君、陆侃如的《中国诗史》则干脆不予叙述，只当它已经死了。

近代“中国文学史”这个学科建立以后，宋代文学的处境即是如此。在《中国大百科全书》的中国文学概述中，周扬与刘再复撰写的这个词条，关于宋代，只有“词，达到了可以和唐诗并列的中国文学的另一座高峰，出现了一批大词人，如苏轼等”这一句话，此外一个字也未提及诗，即连古文也只是说唐代之韩、柳，其余宋代文学之发展与成就，就更不用说了。

风气渐变，须等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。特别是在北京大学编辑了《全宋诗》、四川大学编辑了《全宋文》以后。全宋诗，本来台湾黄永武、张高评先生也编了一部，因与北大项目雷同，出版社不愿付梓，遂使两岸互辑之异同迄今无法考按。《全宋文》也因出版问题，延宕十载，方得出齐。这些，都降低了它们的影响力。可是纵然如此，对研究中国文学及文学史的学者来说，仍有视野洞开、天宇豁然之感，发现从前啥也没看就信口雌黄，谈盛衰、论规律，实近乎无知而妄作。

主持《全宋文》这项改造我们文学史观大工程的，便是曾枣庄先生。先生笃实诚朴，自相识于今，十余载间，无一日不治学，无一晤不论学。近来养痾蓉城，仍有著作不断问世，颇令我辈愧汗。

我当然不足以知先生，但以我管见所及，先生治学有几个特点：

一是善于组织，集腋为功。治学，有人喜欢单打独斗，事实上做学问本来也就应该只是自己做，古之学者为己，没听说老是搞集体生产的。可是，某些情况，独木难支，个人力量却也是做不来的。例如文献之征集整理，当然要众擎才易举。曾先生主持川大古籍所，对此特别着力，故学风朴实而成果斐然。许多学者，本身武艺虽好，却不适宜指麾部众、规模远略，曾先生则与之不同，他是很有将才的。

二是考述并重，文史合一。做文献的朋友，擘积之功多，史考为长。但往往因此而不能综揽全局，或进而评鹭论秩古人之是非优劣。也就是能考史而无力述史。述史须要综合归纳的工夫及叙事的本领，与考史之分析枝末，着重于局部者颇异其趣。曾先生却能兼此二事，所著《三苏评传》，均搭配以诗文选集及汇评，两相辉映，足见一斑。而文史合一则更难。古籍整理本属于史部的工夫，能得文章趣味者甚少。曾先生的文献整理，却始终关注于文学问题，希望能以其考案所得，贡献于文学史研究，斯所以为难能。

本编，我以为就是在《全宋文》的基础上，更集中发挥先生之长的表现。曾先生与吴洪泽先生仍采合作模式，充分显示了我所说的第一项特点。他们曾合著过《苏辛词选》，也合编过《中华大典》的宋辽金元部分。本书之合作，亦属天孙织锦，锻合无间，不太看出来有风格或内容上的差异。在考述并重、文史合一方面，则本编在《宋人年谱丛刊》、《北宋文学家年谱》等旧作的基础上，对作品之系年与作家之生平、仕履、籍里、交游等等颇多着墨，以期因年系事，即事考文。但又有论有案，或综括每一期文学发展之脉络，或分评一家之短长，或析史疑，或通积滞，体兼章实斋所说的史考与史著，而又足以见史识。

此外，编年史虽然是我国最早的史体，但用在讨论学术思想或文艺上却甚晚。宋、元、明、清诸学案均是以人为纲，事实上仍是纪传体之规制。直到民国时期唐晏的《两汉三国学案》才以《易》、《书》、《诗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、

《春秋》为类，刘汝霖的《汉晋学术编年》才采编年体。本编则融通变化，以编年为主，而实兼纪传及纪事本末。这应是本编创用之体例。我二十多年前作《江西诗社宗派研究》时，特列年表一种，以为论史之作，不能无表谱以为之辅。如今本编则是以年表为经，辅以纪传与纪事本末，体若相反，其旨同符，观之深感契合。

本书唯一可商者，或许在于他们所说的“宋代文学发展的规律”，把宋代文学划为四期：北宋前期、北宋后期、南宋前期、南宋后期。这四期，一来不能称之为“规律”，二来太像唐诗的初、盛、中、晚之分，是否可另做区划，宜再商量。但编年之书，以时为断，厘为四卷，也没什么大错，我亦不敢以此吹求。本编卷帙浩繁，创见迭出，足证功力。我粗窥堂庑，略述一二，其实无当旨要，姑志钦迟之意而已！

丙戌芒种，龚鹏程写于北京小西天如来藏

前言

一

西方文论和现当代文论以诗歌、文学散文、小说、戏剧为文学作品。研究中国古典文学，得从中国古典文学的客观实际出发，不能照搬西方文学和现当代文学的概念。如果只有诗歌、戏剧、小说和抒情性散文才算文学，只有纯艺术而非教化性的、纯虚构而非记实性的才算文学，恐怕会得出中国古代无文学，或有也少得可怜的结论。元明清的戏剧、小说是否够得上这种纯文学的标准，恐怕也要打个大大的问号。

先秦、两汉，文学的含义较广，兼有文章、博学之义，文学、史学、哲学、法学都囊括在内，几乎等同于现在所说的社会科学。魏晋南北朝，文学的含义逐渐接近后世的泛文学观念，渐有文笔之分，刘勰《文心雕龙·总术》讲得很明确：“今之常言，有文有笔，以为无韵者笔也，有韵者文也。”萧统《文选序》区别了文学与非文学界限，他的文学观实为中国古代泛文学观的代表。他说：“自姬、汉以来，眇焉悠邈，时更七代（指周、秦、汉、魏、晋、宋、齐），数逾千祀。词人才子，则名溢于缥囊；飞文染翰，则卷盈乎绡帙。自非略其芜秽，集其菁英，盖欲兼功太半，难矣。若夫姬公之籍，孔父之书，与日月俱悬，鬼神争奥，孝敬之准式，人伦之师友，岂可重以芟夷，加以剪裁？老、庄之作，管、孟之流，盖以立意为宗，不以能文为本，今之所撰，又以略诸。若贤人之美辞，忠臣之抗直，谋夫之话，辨士之端，冰释泉涌，金相玉振，所谓坐狙丘，议稷下，仲连之却秦军，食其之下齐国，留侯之发八难，曲逆之吐六奇，盖乃事美一时，语流千载，概见坟籍，旁出子史。若斯之流，又亦繁缛，虽传之简牍，而事异篇章，今之所集，亦所不取。至于记事之史、系年之书，所以褒贬是非，纪别异同，方之篇翰，亦已不同。若其赞论之综辑辞采，序述之错比文华，事出于沉思，义归乎翰藻。故与夫篇什，杂

而集之，远至周室，迄于圣代，都为三十卷，名曰《文选》云尔。”这篇《文选序》的内容很重要。他编选此书的目的是“略其芜秽，集其菁英”，这是明代全文总集出现以前，总集的共同特点，都是选本式总集，选文标准是“以能文为本”，专收“综辑辞采”，“错比文华”，“事出于沉思，义归乎翰藻”，也就是堪称文学作品者。根据这一标准，他不收经书，即“姬公之籍，孔父之书”；不收子书，即老、庄、管、孟之作。史书只收赞论之有文采者，不收谋夫辩士之论。可见他已初步明确了文学作品与非文学作品的界限，而其《文选》只选“能文”的作者和富有文采的作品。所以在《文选》中，多选辞藻华丽，声律谐婉的楚辞、汉赋和六朝骈文，诗歌也主要选对偶严谨的颜延之、谢灵运等人的作品，而陶渊明自然平易的作品入选较少。《文选序》又云：“凡次文之体，各以汇聚。诗赋体既不一，又以类分；类分之中，各以时代相次。”也就是说，《文选》是分体分类编排，各类之文又以时代先后为序。他把所选的诗文分为赋、诗、骚、七等三十九体，每体又按题材内容分若干小类。

此书的泛文学观念成了中国古代传统的文学观念，对后世影响很大，宋初李昉等奉敕编纂的《文苑英华》，姚铉编纂的《唐文粹》，南北宋之际吕祖谦编纂的《皇朝文鉴》，元苏天爵编纂的《元文类》等，皆沿其波，收文范围及其文体分类，都大体遵循萧统的泛文学观念，不论何种文体，只要是“事出于沉思，义归乎翰藻”，即有思想性和艺术性的美文，都视作文学作品。直至清人编《古今图书集成》，其《文学典》也是沿用这种泛文学观念。现当代的古典文学研究者，其文学观念同样是泛文学观念。朱东润主编的《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》是影响较大的一部选本，它就收有奏议，如李斯《谏逐客书》；札子，如王安石《本朝百年无事札子》；封事，如胡铨《戊午上高宗封事》；表，如诸葛亮《出师表》、曹植《求自试表》；移文，如孔稚圭《北山移文》；檄文，如骆宾王《代李敬业传檄天下文》；奏状，如陆贽《奉天请罢琼林大盈二库状》；墓志铭，如韩愈《柳子厚墓志铭》；碑，如陆龟蒙《野庙碑》、苏轼《韩文公庙碑》；阡表，如欧阳修《泂冈阡表》。按西方和当代的文论，这些文体都不属文学作品，但据“事出于沉思，义归乎翰藻”的传统的泛文学观，这些却不失为文学名作。

本书所说的宋代文学也是泛文学意义上的宋代文学，只要有一定思

想性和艺术性的宋代作品,凡思深、情挚、文字优美的宋代诗、词、文、诗话、词话、文话、小说、笔记,都属于本书的编年范围。

二

关于如何编写中国文学史,多年来争论不休。新出版的几种文学史,包括新出版的几种文学编年史,似乎也不尽如人意。中国史学最发达,作为史书之一的中国文学史,可否从中国史书的编法中得到一些启发呢?《宋代文学编年史》想对此作一些尝试。

第一,中国最早的史书为编年史,以时间为顺序,按年、月、日编写。中国最早的编年体史书为《竹书纪年》,纪夏、商、西周和春秋时晋国、战国时魏国的史事,至魏襄王二十年(前 299)为止。此书早已失传,仅有辑本传世。今存最早的编年史是相传孔子据鲁史修订整理而成的《春秋》,起于鲁隐公元年(前 722),迄于鲁哀公十四年(前 481),共二百四十二年的历史。文字简短,寓有褒贬之义,被誉为“春秋笔法”。解释《春秋》的有三传(《左传》、《公羊传》、《穀梁传》)。此后的《汉纪》、《后汉纪》,各朝起居注、实录、正史中的本纪,均用编年体。《春秋》之后,中国最重要的编年体史书为宋代司马光的《资治通鉴》,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(前 403),下迄宋王朝建立前即后周世宗显德六年(959),长达一千三百六十二年,是宋以前的编年通史。西方哲人说过,历史的就是逻辑的。以时间为顺序,以年、月、日为序来撰写宋代文学史,也许最能反映宋代文学的发展脉络。只是中国古代的各体史书都详于政治、军事,略于经济、文化,包括文学。本书既为《宋代文学编年史》,当然要略于政治、军事、经济而详于文学,举凡宋代的诗、文(文又包括辞赋、四六、散文和韵文)、词、诗话、词话、文话、小说、戏剧、文学性笔记,都属于《宋代文学编年史》的编年范围。

第二,中国史书的又一种写法为纪传体,这是以人物传记为中心的史书,始于西汉司马迁的《史记》,以后各朝为前代修史都用纪传体,成为“正史”。其体例是以“本纪”记皇帝事迹兼记国家大事,具有编年体史书的性质;以“世家”记王侯封国和特殊人物;以“表”编系年代、世系及人物;以“书”或“志”记载典章制度;而其主体为“列传”,记载各种人物、民族及外国情况。中国纪传体史书中,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设有《儒林传》,《后汉书》还

在《儒林传》外设有《文苑传》，可说是中国最早的以文学家为纲的文学史。以后的纪传体史书大体仿此，加上其他一些单独列传的著名作家，实为中国断代纪传体文学史。《古今图书集成·文学典》中的《文学名家列传》则可视作通代纪传体文学史。直至近现代受西方学术思想的影响，才出现了以章节标题的文学史。但时间过去了一百多年，大家对这样的文学史也不太满意，说它们是作家、作品汇编。但离开了作家、作品，还有什么文学史呢？因此，《宋代文学编年史》也要对宋代的文学家、文人交往、文学名著、名篇以及宋人对前代文集，特别是对唐代文集的研究整理（善于汲取前人的文学成就是宋代文学发达的重要原因之一）和评论（这是宋代文学思想的重要体现）等各个方面作详尽编年。只是对宋代文学家的编年，本书汲取纪传体史书的长处，相对集中叙述。如果纯用编年体叙述作家生平事迹，那将非常分散，而且有些作家的事迹也无法系年，不如相对集中叙述为好。因此，本书将充分汲取纪传体史书《文苑传》的写法。中国纪传体史书的《文苑传》，往往叙事简而引用文学名篇却不惜篇幅，有些作家的集子早已失传，其文学名篇往往赖《文苑传》以传。仿此，本书的作家简介只撮述大意，一般不引或只节引原文。宋代诗、词、文的名篇太多，故一般只系年而不载原文，只有涉及文艺思想、文学评论者，不引原文不足以说明其观点，才引用原文。引文一律注明出处，以便读者复核。

关于编年体史书和纪传体的优劣，宋人孙甫（998—1057）《唐史论断·序》（《唐史论断》卷首）称美编年体史书“体正而文简”：“古之史，《尚书》、《春秋》是也，二经体不同而意同。”之所以说“体不同”，是因为“《尚书》记治世之事，作教之书也”；“《春秋》记乱世之事，立法之书也”；“此《尚书》、《春秋》之体所以不同也”。之所以说“意同”，是因为“《尚书》、《春秋》记治乱虽异，其于劝戒，则大意同也”。他批评司马迁开创的纪传体不明“治乱之本、劝戒之道”：“司马迁修《史记》，破编年体，创为纪传，盖务便于记事也。记事便则所取博，故奇异细碎之事皆载焉。虽贯穿群书，才力雄俊，于治乱之本、劝戒之道，则乱杂而不明矣。”又批评纪传体“一事分为数处”：“纪传所记处，前后屡出，比于编年则文繁。”并失年代之序：“《尚书》虽不谨编年之法，君臣之事，年代有序。羲和之业，固载于《尧典》；稷、契、皋、夔之功，固载于《舜典》。三代君臣之事，亦犹是焉。迁以人臣谋议功勋与其家

行细事，杂载于传中，其体便乎？复有过差邪恶之事以召危乱，不于当年书之以为深戒，岂非失之大者？”但他也不赞成“史之体必尚编年，纪传不可为”的说法，认为：“为史者习尚纪传久矣，历代以为大典，必论之以复古则泥矣。有能编列君臣之事，善恶得实，不尚僻怪，不务繁碎，明治乱之本，谨劝戒之道，虽为纪传亦可矣。必论其至，则不若编年体正而文简也。”这就是本书以编年体为主，而兼纪传体的原因。

第三，南宋产生了一种新的史书体裁，这就是纪事本末体，以重大历史事件分别立目，独立成篇，各篇又按事件的时间顺序撰写。始于南宋袁枢的《通鉴纪事本末》，是为补《资治通鉴》史事分散之不足而作。杨万里《袁机仲通鉴本末序》（《诚斋集》卷七八）云：“予每读《通鉴》之书，见其事之肇于斯，则惜其事之不竟于斯，盖事以年隔，年以事析，遭其初莫绎其终，揽其终莫志其初，如山之峨，如海之茫，盖编年系日，其体然也。今读子袁子此书，如生乎其时，亲见乎其事，使人喜，使人悲，使人鼓舞，未既而继之以叹且泣也。嗟乎！由周秦以来，曰诸侯，曰大盗，曰女主，曰外戚，曰宦官，曰权臣，曰夷狄，曰藩镇，亦不一矣，而其源亦不一哉。盖安史之乱，则林甫之为也；藩镇之祸，则令孜之为也，其源不一哉。得其病之之源，则得其医之之方矣，此书是也。有国者不可无此书，前有奸而不察，后有邪而不悟；学者不可以无此书，进有行而无征，退有蓄而无宗。此书也，其入《通鉴》之户欤！虽然，覩人之病，戚人之病，理人之病，得人之病，至于身之病不懵焉，不讳焉，不医之〔拒〕〔距〕焉，不医而缪其医焉，古亦稀矣。彼暗而此昭宜也，切于人，纾于身，可哀也夫。”吕祖谦《书袁机仲国录通鉴纪事本末后》（《东莱集》卷七）云：“《通鉴》之行百年矣，综理经纬，少或知之，习其读而不识其纲，则所同病也。今袁子掇其体大者，区别终始，使司马公之微旨，自是可考。躬其难而遗学者以易，意亦笃矣。”朱熹《跋通鉴纪事本末》（《朱文公文集》卷八一）云：“古史之体可见者，《书》、《春秋》而已。《春秋》编年通纪，以见事之先后；《书》则每事别记，以具事之首尾。意者当时史官既以编年纪事，至于事之大者，则又采合而别记之。……左氏于《春秋》既依经以作传，复为《国语》二十余篇，国别事殊，或越数十年而遂其事，盖亦近《书》体，以相错综云尔。然自汉以来为史者，一用太史公纪传之法，此意固不复讲。”朱熹认为，《春秋》为编年体，本末体实沿于《书经》、《国语》。

朱又云：“至司马温公受诏纂述《资治通鉴》，然后千三百六十二年之事，编年系日，如指诸掌。……伟哉书乎！自汉以来，未始有也。”但也有缺点：“一事之首尾，或散出于数十百年之间，不相缀属，读者病之。”这正是袁枢创纪事本末体的原因：“今建安袁君机仲，乃以暇日作为此书，以便学者。其部居门目，始终离合之间，又皆曲有微意，于以错综温公之书，其亦《国语》之流矣。”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对此书评价也很高：“古之史策，编年而已，周以前无异轨也；司马迁作《史记》，遂有纪传一体，唐以前亦无异轨也；至宋袁枢以《通鉴》旧文，每事为篇，各排比其次第而详叙其始终，命曰‘纪事本末’，史遂又有此一体。”（卷四九《纪事本末类·序》）又云：“唐刘知幾作《史通》叙述史例，首列六家，总归二体，自汉以来，不过纪传、编年两法，乘除互用。然纪传之法，或一事而复见数篇，宾主莫辨；编年之法，或一事而隔越数卷，首尾难稽。枢乃自出新意，因司马光《资治通鉴》，区别门目，以类排纂，每事各详起讫，自为标题，每篇各编年月，自为首尾。始于三家之分晋，终于周世宗之征淮南，包括数千年事迹，经纬明晰，节目详具，前后始末，一览了然。遂使纪传、编年贯通为一，实前古之所未见也。”（卷四九《通鉴纪事本末》）

除袁枢撰有《通鉴纪事本末》外，章冲还编有《左氏传事类始末》，谢谔《左氏传事类始末序》（《古今图书集成》经籍典卷一六九）云：“谔幼年于诸书爱《左氏》之序事，因一事必穷其本末，或翻一二叶或数叶，或展一二卷或数卷，唯求指南于张本。至其甚详则张本所不能尽，往往一事或连日累旬不得要领。况掣肘于他书他事，则力有不专，自长至老，应桑蓬于四方物色，办此者为谁氏？近收天台使君章冲茂深书，且以《左氏事类本末》为寄，于是恍然见所未见。盖《春秋》之法年为主而事系之，使君之法事为主而年系之，以事系年而事为之碎，以年系事而事为之全，二者不可一废。纪年也，故以事系而年全；纪事也，故以年系而事全。事系年而年全者，史法也；年系事而事全者，考史法也。乃相为表里欤！”一般只知袁枢创纪事本末体，从此序可知，同时还有章冲亦创此体。

纪年体，年为主而事系之，纪事本末体以事为主而年系之，解决了“事以年隔，年以事析”的问题。编年体以时为经，纪传体以人为经，而纪事本末体以事为经，三者皆不可废，各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，故现已形成完整

的系列,有《左传纪事本末》、《通鉴纪事本末》、《宋史纪事本末》、《元史纪事本末》、《明史纪事本末》等。我们编写宋代文学史,能否把中国史书的这三种写法结合起来呢?本书想略作一试。

为了再现宋代文学发展的历史环境,《宋代文学编年史》将包括对文学有重大影响的历史事件、文学事件、文学结社(流派)的编年。这类内容,有的跨时较长,涉及的人物较多,按以时为纲的编年体或以人为纲的纪传体来撰写,都将支离破碎,只有用纪事本末体的写法才能把对文学有重大影响的历史事件、文学事件、文学结社叙述得眉目清楚。如江西诗派是宋代十分重要的诗歌流派,统治南北宋诗坛将近百年,涉及的诗人数以百计。无论按时还是按人都将很分散,故在绍兴三年癸丑(1133)五月吕本中撰《江西诗社宗派图序》处,作集中论述。先引其序,接着引夏倪对宗派图排序的不满,再引历代对《江西诗派诗集》一书的著录,最后补叙江西派诗人李惇、李彭、杨符等,这实际上是借鉴了纪事本末体史书的写法。其他如对西昆派、乌台诗案、车盖亭诗案等也大体采用了同样的处理方法。

第四,纪传体史书往往以“书”或“志”记载典章制度。与此相类,中国还有一种典章类史书即所谓“十通”(《通典》、《通志》、《文献通考》、《续通典》、《续通志》、《续文献通考》、《清通典》、《清通志》、《清文献通考》、《清续文献通考》),记载食货、选举、职官、礼、乐、兵、刑、州郡、边防的有关体制。文学也有自己的体制,这就是文体,诗、文、词、曲的各种体裁,如诗之四言、五言、六言、七言、杂言、古体、近体;文的辞赋,如骚体辞、汉赋、骈赋、律赋、文赋;骈体四六的制、诏、表、启;散文的论、记、书、序、题跋;诗词以外的各种韵文如箴、铭、赞、颂、哀祭文之类。古人十分重视文体研究,先秦两汉论及文体者已不少,魏晋南北朝以后更多,如三国时曹丕《典论·论文》论及奏、议、书、论、铭、诔、诗、赋八体,晋人陆机《文赋》论及诗、赋、碑、诔、铭、箴、颂、论、奏、说十体,《文心雕龙》五十篇有二十一篇专论文体,论及骚、诗、乐府、七、赋、颂、赞、祝、盟、铭、箴、诔、碑、哀、吊、杂文、谐、隐(谜语)、史传、诸子、论、说、诏、策、檄、移、封禅、章、表、奏、启、议、对、书、记三十余体,是中国文体学成熟的标志。宋人严羽《沧浪诗话·诗体》所论,既指五、七言等诗歌体裁,又指诗歌风格,包括以时而论的建安体、黄初体等,以总集而论的选体、玉台体等。这是宋人对文体学的巨大贡献。清代编的《古今图书集

成》，其《文学典》共四十九部，除文学总部为文艺理论和文学名家列传外，其他四十八部皆论文体，可说是中国古代文体学的集大成。可惜近百年来来的各种文学史对文体很少重视，即使专体文学史，如诗史、词史、散文史之类，也只注意这种文体的名家名篇，对诗、词、文等各种体裁本身及其演变同样很少论及。本书对宋人的文体论给予了充分的篇幅。

第五，中国史书往往以类似按语的形式表明作者的看法，称谓五花八门，但“其义一揆”，均属史论。刘知幾《史通》卷四《论赞》云：“《春秋》左氏传每有发论，假君子以称之，二传云公羊子、穀梁子，《史记》云太史公，既而班固曰赞，荀悦曰论，《东观》曰序，谢承曰论，陈寿曰评，王隐曰议，何法盛曰述，扬雄曰撰，刘昞曰奏，袁宏、裴子野自显姓名，皇甫谧、葛洪列其所号，史官所撰通称史臣。其名万殊，其义一揆。”刘克庄《题方汝一班史赞后》（《后村先生大全集》卷一〇七）云：“太史公始人各为传，传后又各系以己见，谓之赞。……班（固）、范（曄）于赞尤不苟，班步骤《史记》而不觉相犯，范自谓‘赞是吾史杰思，无一字虚设’。”徐师曾《文体明辨序说》云：“古者史官各有论著，以订一时君臣言行之是非。然随意命名，莫协于一。故司马迁《史记》称太史公曰，而班固《西汉书》则谓之赞，范曄《东汉书》又谓之论，其实皆评也，而评之名则始见于《三国志》（指各卷末的“评曰”）。”仿此，本书以按语形式，对一些重大问题作综合性论述。这类按语以及用纪事本末体所作的综合性论述，一部分为新撰，另有一部分节录自曾枣庄在《文学评论》、《文学遗产》等刊物上发表过的专论，在此特向《文学评论》、《文学遗产》等刊物的责任编辑致谢。

总之，本书主要借鉴中国编年体史书的写法，同时汲取纪传体、纪事本末体、典章体、史赞的长处，来写《宋代文学编年史》。力争写成史，而不是写成“宋代文学大事记”。较之已出的编年体文学史，本书在体例方面作了以上尝试，是否可行，有待读者评判。

三

本书力求阐明宋代文学发展的脉络，给每位作家勾勒出尽量完整而又简明的传记，阐明宋代文学全面繁荣的原因，向读者提供较为准确的史料。

本书以时间顺序编写宋代文学史，本来最易于表现宋代文学的发展

脉络,但因其“事以年隔,年以事析”,若不闭目沉思,反而不易看出宋代文学发展的脉络。为补此不足,本书一开头就先概述宋代文学发展的四个阶段:北宋前期,诗文词均未脱唐人窠臼;经过北宋诗文革新,欧阳修完成了宋代文风的转变,形成宋代特有的散文风格;北宋后期形成了骈文、散文分疆而治的局面,诗、词、文(散文与四六文)、赋都形成了宋代特有的风貌,即所谓“宋调”;南宋前期的文学并未因为北宋的灭亡而衰落,反而出现了以尤、杨、范、陆为代表的中兴气象;宋代文学的真正衰微是在南宋后期,四六文以流丽为宗,体格卑弱,诗坛出现了转学晚唐的永嘉四灵和江湖派,可喜的是格律派词人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就。这就是宋代文学发展的大体概貌。本书就按宋代文学的这一发展脉络,分为四卷,第一卷为北宋前期的文学,包括太祖、太宗、真宗、仁宗、英宗五朝(960—1067);第二卷为北宋后期的文学,包括神宗、哲宗、徽宗、钦宗四朝(1068—1126);第三卷为南宋前期的文学,包括高宗、孝宗、光宗三朝(1127—1194);第四卷为南宋后期的文学,包括宁宗、理宗、度宗、恭帝、端宗、赵昺六朝(1195—1279)。每卷开头都有小序,概括宋代各个阶段文学的不同风貌。例如第二卷一开头就说,北宋后期是宋代诗、词、文风貌完全形成的时期。欧阳修领导的北宋诗文革新,完成了宋文革新。但只有到了苏轼、黄庭坚、陈师道,才完成了宋诗革新;只有到了苏轼、秦观、贺铸、周邦彦,才完成了宋词革新;宋代诗词文的特有风貌才完全形成。

文学实为人学,离开文学家及其作品,就很难算文学史。本书虽为《宋代文学编年史》,但力求利用历代正史《文苑传》的长处,对作家事迹系年,尽量做到本末完整而不致零散。大家、名家有生年者,本书于其出生年处简介其生卒年、字号、籍贯、生平梗概;名家的重要仕履、重大文学活动、重要作品仍分别系于各年;卒年处择要录其著述及历代对其文学成就的评价。小家有生卒年者,仍仿名家之例,于其生年处作生平简介,卒年处作文学成就评介。生卒年不详者或有缺者,一般不分年系其仕履,只于其生年、卒年或重大事件处(如进士及第、某年任某职、某年有何重要活动)总述其梗概。如郭忠恕生年不详而卒年详,就于其卒年处(977年),对他作简明介绍。柳永之父柳宜生卒年不详,因他与王禹偁有交往,王有《送柳宜通判全州序》(《小畜集》卷二〇),故把对他的简介系于与王交往处。个别作家

虽有生卒年,但其所经历之某事件颇能说明文学发展脉络,亦系该事件处。如刘幾(辉)的生卒年皆详(1030-1065),但他两次参加进士考试的文风迥然不同,颇能说明欧阳修主持科举考试,严厉打击太学体,对推动北宋古文革新的作用,故他的事迹既未系于生年处,也未系于卒年处,而系于嘉祐四年(1059)进士及第时。书末附有人名索引,通过索引不难检索每一位作家的基本情况。

宋代文学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全面繁荣,宋代的文艺思想、辞赋、散文、四六文、诗、词、诗话、词话、小说、笔记等都很发达,本书力求阐明宋代文学的全面繁荣及原因。宋代文学全面繁荣的原因很多,中唐以来的社会变革,特别是庶族地主取代门阀地主而登上政治舞台,工商业的发展特别是雕版印刷的发达,都是宋代文学繁荣的原因。这是宋代文化、文学繁荣的社会基础和经济基础。宋主好文也是重要原因之一,正如《宋史·文苑传序》所说:“艺祖(即太祖)革命,首用文吏而夺武臣之权,宋之尚文,端本乎此。太宗、真宗,其在藩邸,已有好学之名。及其即位,弥文日增。自时厥后,子孙相承,上之为人君者,无不典学;下之为人臣者,自宰相至于令录,无不擢科。海内文士,彬彬辈出焉。”宽松的文化政策也是宋代文学发达的重要原因。宋太祖夺得天下后不久,就立下戒碑,内容之一是“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”,除南宋初年陈东、欧阳澈被杀外,宋代诸帝基本上是遵守了这一誓言的。大中祥符二年(1009),杨亿诸人的《宣曲二十二韵》引起谗臣告密,真宗下文禁诏,也仅仅是警告而已,杨亿诸人并未因此获罪。以后因诗获罪者虽越来越多,有所谓三大诗案(眉山诗案、车盖亭诗案、江湖诗案),但并未杀士大夫。儒释道三教并崇也是宋代文化政策较为宽松的表现。宋王朝对科举考试的重视,是重视儒教的集中表现,是宋代文化、文学发达的重要原因之一。故于宋太祖建隆元年(960)二月举行宋代第一次科举考试处,加“按”对宋代的进士科作了综合性论述;制科考试为宋代选拔了不少人才,故于咸平四年(1001)查道、陈越、王曙应制科试处,对宋代制科作了系统论述。乾德四年(966)四月李霭因反对佛教而流配沙门岛,开宝二年(969)太祖召见道士苏澄,都分别加“按”就宋王朝对佛教、道教的政策作了系统说明。刻书业的发达是宋代文学发达的重要原因之一,因此在景德二年(1005)邢昺谓“今板本大备”处,对宋代出版业作

总体论述。教育的普及是宋代文化与文学发达的另一原因,故在建炎二年三月邓肃作《沙县重修县学记》处,对宋代重视教育作了总体论述:“凡民事有大小,政有先后,莫大于教民,莫先于立学。”对前代文学的全面继承,也是宋代文学发达的重要原因之一。太宗、真宗两朝就编了四部大书,即《册府元龟》、《太平御览》、《文苑英华》、《太平广记》。《文苑英华》上承《昭明文选》,广收南朝梁末至唐代的诗文,很多唐人诗文均赖此书保存,是清人编《全唐诗》、《全唐文》的重要资料来源。《太平广记》所收稗官野史、小说笔记多达四百七十五种,很多书早已失传、残缺,赖此书保存至今,是我们研究小说史的重要资料。两书对我们全面继承古代文学有不可磨灭的贡献。宋人很重视学习前代文学,宋初有所谓三体:白体、昆体、晚唐体。白体学白居易,昆体学李商隐,晚唐体学姚合、贾岛。但宋人学得最多是李、杜、韩、柳。宋人对前代文集,特别是唐代文集的研究、整理和评论,本书都作了详尽记录,并在相关位置作了系统论述,以说明宋人对前代文学特别是唐代文学的继承。

本书力求为读者提供准确的史实,对宋代文学的一些史实作了较多的考订,提出了自己的看法。关于作家生卒年,苏轼门人李之仪的生卒年过去多不详,本书编者早年根据其《寄耀州毕九》(《姑溪居士后集》卷三)“我初与子未束发,长我一岁今皆翁”,确定了李的生年。耀州毕九即毕仲游,《毕仲游墓志铭》(《永乐大典》卷一二〇五)云:“改秘阁校理、知虢州,未行,知耀州。”又云:“宣和三年七月二十八日以疾卒,享年七十五。”宣和三年即1121年,上溯七十五年,则毕当生于庆历七年(1047)。毕长李一岁,则李当生于1048年,这一结论已为学术界普遍接受。李之卒年,周紫芝《姑溪三昧序》(《太仓稊米集》卷五一)有“政和四年”(1114)“后三年而公(李之仪)亡”语,有学者本此认为李卒于政和八年(1118)(《文学遗产》2005年第六期《李之仪卒年考实》),则卒时为七十一岁。然王明清《挥麈后录》卷六谓“端叔终朝议大夫,年八十而卒”。之仪于1048年生,下推八十年,则当卒于建炎元年(1127)。《东都事略·李之仪传》谓“卒年八十余”,则当卒于此年以后。二书皆宋人著作,不可轻易否定。李之仪《杂挽诗四首》(《姑溪居士后集》卷一三)也有“投地三千箴,年光八十春”句,似当以“年八十而卒”、“卒年八十余”为是,故本书系李之卒于建炎元年(1127)。